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她是时下惟一健在的中共六大见证者，是开国大典上的俄语播音员，也是共和国第一批驻外记者。她还有一个特别身份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继女——

# 瞿独伊：家史与心史的深情独白

□ 吴志菲

在不久前“七一勋章”颁授中，新华社国际新闻编辑部翻译和编辑瞿独伊是29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也是唯一的新闻界人士。

少为人知的是，1921年11月生于上海的瞿独伊，是时下惟一健在的中共六大见证者，也是共和国第一批驻外记者。1949年10月1日，她作为俄语播音员在天安门城楼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了有关开国大典的报道。她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继女。笔者专访过瞿独伊，感受过她家史与心史的深情独白。

## “父亲是破落旧家庭的‘叛逆者’”

在长汀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屹立着坐北向南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当年少有林木的罗汉岭如今已全然被绿色笼罩着，之中有株生长得郁郁葱葱的柏树，是1984年9月，瞿独伊从北京专程来此瞻仰时种下的。谈起瞿秋白的牺牲，瞿独伊的评价是“无比壮烈”。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那时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都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于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常州武进瞿氏，门台很高，是“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做实任的官，早就穷了。瞿秋白幼时只靠叔祖和伯父的官俸过几年“少爷生活”。他自幼喜欢诗词，精读诗书，母亲也常常教他写诗作词，待年龄稍大一点就喜欢与“名士化”的少年们一切切磋。父亲瞿君范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教小秋白学画。瞿秋白10岁那年大年初一，父亲给他买了一部《三国演义》，其中插入了许多惟妙惟肖的人物绣像。如此熏陶教育，瞿秋白十几岁时就能作很好的山水画了。

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瞿秋白却在无锡辍学了。失去上学机会，他常常闷在房中读书，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每餐不足一小碗饭。这对一个才16岁的少年来说，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不料，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1916年春节刚过，当他在无锡表姐处找工作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自杀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瞿家带来天崩地裂的震撼。

母亲性情柔中带刚，对秋白特别慈爱，并寄予极大的希望。家道衰败，要强的她鼓动丈夫出外谋业，并将婆婆送去大哥哥家，却不料婆婆在大儿子家亡故，以致亲朋们都责怪她害死婆婆。也因为这个缘故，亲友不再对瞿秋白兄弟姊妹六人施以援手。瞿母想：惟有自己去世，才能换来他们对孩子们的照顾。所以，在年前她就准备自尽。趁瞿父和瞿秋白都不在家的時候，要大女儿秋琴去舅舅金声借家。让那不懂事的二儿子阿云买来两盒红头火柴，把剧毒的火柴头全部剥了下来，然后就是选择服毒的日子。那次除夕家宴她有意吃得丰盛些，丈夫与孩子们都很高兴，丝毫没有察觉到她的异常之处。正月初五的夜晚，她吞下了用烧酒拌和的两盒红头火柴头，次日离世。

这一悲剧留给瞿秋白强烈的心理刺激，而且在他一生中发生恒久而有力的牵系作用，使瞿秋白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影响。他常常说起母亲的自尽，而每次谈到时就沉默很久。母亲在世时，瞿秋白最爱也最能体贴母亲，而母亲也最疼爱这个长子。家庭拮据时，母亲决定让他辍学，找个教学工作，挣点钱，分担家里的困难，他顺从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能够这样做，能够这样体会母亲的心情，替母分忧，难能可贵。

母亲去世时，没有家产又没有工作的父亲怎能抚养得了6个小孩子?在瞿秋白的协助下，父亲把一个孩子安排在亲人家生活并接受教育，把那个自幼迟钝、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带在身边。

瞿秋白一直很关爱弟弟妹妹，努力维系着失去母亲后的亲情联系，也一心想把弟弟们教育成才。1916年冬，瞿秋白和三弟一同在武汉黄陂二姑家，表兄周均量教三弟读唐诗，因三弟半天背不出一首绝句，就被罚跪。当时瞿秋白走进书房，大声喝道：“起来，达成这个样子!”表兄生气了，不再教三弟，也不和瞿秋白说话。事后瞿秋白对表兄说，自己不是袒护弟弟，而是反对体罚的教育方法。

1920年瞿秋白赴俄之前，忧煎病迫，孤处

异乡的父亲当时在一位好友家做家庭教师，他专程去济南拜别父亲。父子同榻，谈了整整半宿。父亲对儿子远行赴俄非常支持，不像那些囿于成见、要把子女拴在身边的人。瞿秋白将父亲的话郑重记入其著作《饿乡纪程》，可见他是深有感受而铭记于心的。

“祖母的性情才德和在文化知识、文学情趣上对我父亲的教导和潜移默化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父亲接受和发扬了。这些和祖父的影响相汇合，为父亲自身良好气质打下受用终生的文化素养底子。”瞿独伊晚年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与家史，感慨万千。呷了几口水后，她不免轻声感叹：“家庭破灭后，凄惨的现实逼得父亲趋向脱离旧环境，寻求新价值、新出路。也就更容易接受新潮的思想，悖逆原来那种大家庭制度下‘昏昧’精神的道路。”

## “母亲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

瞿秋白在他感情的历程中也如同他在精神和思想上一样富有，一生有两次爱情相伴。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天资较高的时代女性。1923年8月，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了。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喜爱文学，都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便常常写诗来抒发情感，使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诗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后来，一位叫杨之华的女性走进他的世界……

杨之华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的名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才貌出众，喜欢诗词、音乐，也曾与杨之华一起立志自谋生活，不依赖家庭。但是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这时，杨之华只生下一个女儿，为她取名“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她心中的怨愤之情。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并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报考上海大学，被录取在社会学系。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两门课，以他优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在上大师生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杨之华学习很努力，并且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当时她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担任部分工作，与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向警予在一起。向警予在上大没有担任职务，就积极向上海的党支部书记瞿秋白推荐杨之华。作为勤奋好读的学生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对她显然是熟悉的，她对待妇女解放事业的热爱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更使瞿秋白觉得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于是，瞿秋白决定做她的人党介绍人。后来，在斗争中他们的感情益加深。

渐渐发觉瞿秋白对自己的感情有些异样，而自己内心对他的翩翩风度和绝世才华也十分倾慕，杨之华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回萧山母亲家，暂时回避瞿秋白。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白?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也应该回个明白。于是趁放假的机会，瞿秋白也来到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谁知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三人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藤架上升。谈判结果，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交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特别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了头，身穿袈裟，手捧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有一次刻印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

‘白华之秋’刻成3枚印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杨之华听了笑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瞿秋白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而今，每当瞿独伊看到父母留下的遗物，就宛若看到相伴相依的父母还生活在自己身边。

新中国成立后，杨之华历任全国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女工部长，八届中央监察委员。她在群众中一直有很高声望，做监察工作时被称为“包公”。

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什么不再结婚，她这样回答：“这并不是由于我封建，这是因为我感到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的了。”经过多年努力，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了北京，1955年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文革”中，瞿秋白墓被砸毁，杨之华亦遭诬陷，被“监护”了6年。1973年9月，瞿独伊才被允许探望母亲。她要求护理病重的母亲，专案组不同意，仅允许10天探望一次。10月17日那天，瞿独伊突然被提早几天通知立即去探望。她料想不妙，果然，母亲已奄奄一息。这时，专案组才同意将杨之华转到北大医院抢救。已病人膏肓的杨之华出来只“呼吸”了不到3天的自由空气，10月20日就与世长辞!瞿独伊说：“尽管母亲是愤然离世的，但她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

## “天伦之乐的时光让我记恋终生”

瞿秋白和杨之华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但沈家不让她去看女儿。瞿秋白十分理解杨之华做母亲的心，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

在瞿秋白的积极支持下，1925年春天，杨之华来到浙江乡下的沈家接女儿。瞿独伊才来到了杨之华与瞿秋白的身边，有了一份健全的母亲与父爱。

瞿独伊回忆起这些母亲当年讲述的往事，沉醉在独享天伦之乐的时光中。“母亲忙于工运，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一有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后来我不叫了，那么多爸爸谁信?我就不叫他们爸爸了。”说到这里，瞿独伊沏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我还记得，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我当时很天真活泼的。”

“父亲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路过店铺，总不忘记买一些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毯，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雪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独伊也很高兴，拍手大笑。

到苏联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瞿独伊便被送到了一家孤儿院——里面收留的都是些街头流浪的孩子。瞿独伊在这里待了三四个月，后来住进了森林儿童院。在森林儿童院，为了讲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瞿秋白知道后立刻来信安慰：“独伊：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剃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森林儿童院时的一件事。那次，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妈妈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妈妈也应和着唱。”瞿独伊说：“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

## “父母留下最宝贵的是‘爱祖国’”



在苏联，瞿秋白常和杨之华一起带瞿独伊去俄罗斯友人鲍罗廷家做客，让女儿称他和他的夫人为“爷爷”和“奶奶”。

1930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杨之华也一同回国，把他们年仅9岁的女儿瞿独伊一个人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那么小的孩子，虽说能提供住宿的儿童院里受教育，可完全没有家庭温暖，总让人放心不下，瞿秋白夫妇便把瞿独伊托付给鲍罗廷夫妇看管。每遇假期，每当独伊生病的时候，或者需要照看看护的时候，鲍罗廷夫妇就把她接到家里来。鲍罗廷的小儿子诺尔曼也乐于以“保护者”自居，爱护和关照小独伊。

数十年后，瞿独伊还常常铭记着“最疼爱”她的“爷爷奶奶”鲍罗廷夫妇和有“骑士风度”的诺尔曼。瞿独伊说，当时鲍罗廷在主编用英文出版的《莫斯科新闻》，他几乎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我时时在夜间醒来，从自己的地铺朝写字台偷偷地望去，总会看见他在台灯下伏案工作的高大身影，同时听见他的钢笔在纸上划过时发出的声音。”

瞿秋白在离开上海到苏区的前夕，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女儿独伊。一次，他给独伊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机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机”。细微之处，父爱跃然而出。他对瞿独伊的爱，是他心灵圣洁的表现，是他高尚人格的表现。在监狱里，即将告别人世时，他还惦记着独伊。从小就没有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瞿独伊感到他对自己的爱比普通的生父还要入心，还要周到。瞿独伊从来没觉得自己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1930年瞿秋白的回国，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曼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看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惟独不给我看。我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1935年8月，杨之华第二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杨之华到国际儿童院看望女儿时，许多中国孩子都跑来围着她，亲切地叫她“妈妈”。之后，杨之华留在莫斯科国际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每当天深夜入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语时，杨之华翻看着瞿秋白的遗物与信件，看着看着，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瞿独伊就安慰她：“妈妈，我给你唱个歌吧。”于是，一口气唱了《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曲。母女俩就这样相互安慰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瞿独伊结束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于1941年随母回国，到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在狱中她补习了中文，同时还当了俄文老师，并在这期间收获了爱情，与李何结了婚。“在新疆坐牢的日子很苦，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破庙里，馒头是被有意掺了沙子的，吃的菜没有油，每天两餐清水白菜汤。”在狱中，她和大家一起参加静坐绝食的斗争，要求改善牢狱生活;参加悼念牺牲难友的节日和抗议活动等。

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在新疆的被捕人员获得自由。1946年6月10日，新疆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人员乘坐10辆大卡车，于7月10日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8月，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瞿独伊和李何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他俩随新华社不断行军转移各地，并以积极的工作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开国大典举行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瞿独伊还用俄文广播了毛泽东主席宣读的中

央人民政府公告。不多久，苏联代表团离开北京时，副团长西蒙诺夫向下榻的北京饭店表示谢意，并掏出一些钱作为小费。北京饭店工会主席知道情况后，连连摆手，说：“给你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如果给什么小费，那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侮辱。我们不能接受!”当瞿独伊翻译完，以为这做法在苏联司空见惯的这位副团长随即伸出大拇指，说：“好样的!中国人!”

瞿独伊在开国大典期间接待、翻译上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廖承志的注意，后来他推荐瞿独伊到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可是，在建国初期瞿独伊又和丈夫李何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当时，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他们夫妇俩，“我们每次采访都要通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批准。写好稿子，还要翻译成俄文，到苏联外交部送审，才能寄回国内。我们一般不发电报，电报很贵。住医院也贵，比他们本国人贵5倍左右，他们实在不像一个‘老大哥’。”在这“夫妻店”似的莫斯科分社，瞿独伊没有周六周日，整天忙得团团转。每次进行采访时，瞿独伊戏称夫妇俩是“八大员”(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等)。

1957年瞿独伊回国，“被迫”改行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不治之症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李克林竟因病英年早逝，接连打击使瞿独伊和母亲因过于悲痛而大受刺激。1978年，瞿独伊才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至1982年离休。瞿独伊晚年多次重返莫斯科，追寻早年那里留给她的青春的梦魇。

瞿独伊说：“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谈及父亲的不英雄义举时，她落泪纵横，“‘文革’时，‘四人都’不顾客事，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文革”后，瞿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我去见宋希濂，于我而言，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相。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两人必须见这一面。”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说“此地很好”;而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多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都’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

如今，“秋之白华”的女儿已是百岁老人了，离休后的生活很充实。刚离休时，她曾专门学过画画、钢琴、书法，后来因为忙于寻访有关父亲生平活动的知情人、搜集整理有关材料而又将这些爱好放弃了。晚年，瞿独伊参与编写过《忆秋白》《回忆杨之华》等书。荣获“七一勋章”，瞿独伊心情也是非常激动。据了解，老人家里的电话一时被“打爆”。淡泊名利的她，尽管身体不是很好，但生活依然过得有滋有味，从不向党伸手，从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风范。作为赓续红色基因的革命先烈后代，问起什么是父母留给她的最宝贵的东西，瞿独伊的回答是：“爱祖国!”

（本文为本报《周末人物》专栏，作者吴志菲，系新华社高级记者、作家、评论员）